

藏书楼对近代编辑出版业的传播影响研究

魏秀萍

(兰州文理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 兰州 730000)

摘 要: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 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对促进近代编辑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此期形成众多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 刻书内容包罗万象, 精校精刻久负盛名; 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 且活字、套版及版画印刷术都有长足进步, 呈现出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 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明清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 编辑出版业进入创作旺盛期, 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果, 可谓我国手工业印刷之集大成, 对典籍保护与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藏书楼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为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

关键词: 藏书楼; 近代编辑出版; 刻书业; 出版技术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4)05-0093-06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 不仅提供了大量史料, 而且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藏书家在收藏、保护和传播大量古代文献的同时, 在版本学、校雠学、目录学、辑佚学、辨伪学等诸多方面, 在古籍编纂、刊刻、出版和传播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对促进近代编辑出版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对近代刻书业的大力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就我国现存古籍来看, 唐五代刻书犹如凤毛麟角, 宋元旧刻亦是屈指可数, 明刻本则是汗牛充栋, 较为常见, 其版本千差万别, 需要深入研究^{[1]345}。而清代的“殿版”官刻本、精审的私家刻书及兴盛的坊刻, 都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最精、最盛, 无不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准, 可谓是我国手工印刷业之集大成^{[1]354-356}。总的说来, 明清时

期官刻虽然取得大发展, 但私家刻书的发展速度更快。私家刻书的内容丰富, 数量惊人, 精品书多为民间刻本, 新出版技术多为私家藏书楼发明, 活字印刷技术、套版及版画等方面的印刷技术都有长足进步。全国民间刻书能力与刻书总量都大大超过官府, 中国刻书业从两宋发展到明清时期, 进入以民间刻书业为主体的崭新阶段, 于江南地区呈现出繁盛景象。

(一) 形成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

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 最显著特点就是私家出版蜂起中土, 书坊林立, 刻书业被注入更为浓烈的商品经济意识, 书籍贸易在更大范围、以更为壮观的规模和更激烈的竞争形式空前活跃地展开^{[1]319}。从官府到私坊, 刻书家星罗棋布, 刻书蔚然成风。中国古代刻书业向民间开放的政策, 宋朝已确立, 元朝受挫, 明清时期大力发展。民间刻书业分书商与

收稿日期: 2014-05-23

基金项目: 兰州文理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项目”; “文化传承视域下的古代私家藏书楼研究”(2013ZZ01)

作者简介: 魏秀萍(1967-), 女, 甘肃天水人, 副教授, 从事出版史、文献信息学、出版与文化传播研究。

非书商两部分,非书商刻书大都由士人主持,包括许多藏书大家。明清除继续刊行经部和史部书籍,又将子部与集部书籍都刊印了,其中多为私家刻本,大众通俗类的出版物如异军突起,成为明清书商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民间刻书业呈现出版多元化状态。明清时期的民间刻书业遍布全国,直至穷乡僻壤,出现许多著名的出版中心,比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湖州、徽州、建阳等,此外,还有分布于各地的次出版中心,如江苏常州与无锡、江西南丰与婺源,及湖南永州、贵州贵阳、陕西西安等。凡出版中心,都是民间刻书业的集散地^[2]。

(二)刻书内容包罗万象

据《中国丛书综录》所收,不包括佛、道、藏藏书,古籍丛书就有 2797 种,收书 38891 部,其中大部分为明清江南私家藏书楼所刻^[3]。从明代私家藏书楼刊刻藏书的内容来看,有按时代划分的《汉魏丛书》、《唐宋丛书》;有按地域划分的郡邑丛书,比如《盐邑丛书》、《四明丛书》。丛书类有包罗四部的《范氏奇书》、《格致丛书》、《宝颜堂秘笈》;有专收一类的《子汇》、《古今逸史》等等藏书。而清代的丛书内容精粹,多为江南一带大藏书家所刻,比如《通志堂经解》经籍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为版本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为校讎丛书;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为断代专科丛书;王夫之的《船山遗书》为自著丛书,等^[3]。在明代书籍出版史上,对刻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出版家很多,这些出版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大藏书家。如江苏常熟的毛晋“汲古阁”就最值得一提,毛晋不仅藏书,而且善于刻书,刻书六百余种,又精通抄书。据《书林清话》记载,“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典无不收刻传之。”^[4]

(三)坊刻兴盛,精校精刻久负盛名

明清时期的坊刻随着江南私家藏书楼的发展也兴盛起来。万历、崇祯年间,刻工多居南京、苏州、常熟一带,坊刻遍布全国各地,刻书种类繁多,除医书、类书种类外,小说、戏曲盛行。南京的唐氏富春堂、世德堂,杭州的舒氏藏珠馆、客与堂,建阳的余氏三台馆、郑氏联辉堂等,相继遍刻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还有元曲、明人杂剧等。清代的坊刻书籍量多质好,坊刻业除江苏、浙江、福建外,北京、四川、广东、江西、安徽等地也很盛行。明代私刻本十分精致,如

江苏吴县袁氏嘉堂影刻宋刊大字本《六臣注文选》、《大戴礼记》,顾春世德堂刻的《六子全书》,还有徐氏东雅堂刻的《昌黎先生集》和郭氏济美堂刻的《河东先生集》等都很出名。清代私刻最大成就是边刻印边校勘。其代表人物既是刻书家,又是精通校勘的藏书家,如徐乾学刻印校勘的《通志堂经解》、林佶写刻的《渔阳精华录》、《尧峰文钞》、《午亭文编》,孙星衍校勘的《晏子春秋》,阮元的刻本《钟鼎款识》,郑燮写刻的《板桥集》,金农写刻的《冬心集》等。清代刻书讲究精校精刻,校书之风比明代更盛。清代的著名校勘家也是大藏书家,可谓不胜枚举。比如段玉裁、王引之、顾广圻、阮元、王念孙、戴震、钱大昕、卢文弨等。书籍校讎,一般以丛书为最难,因为丛书内容最复杂。清代以编纂丛书为最盛,刊刻丛书同样追求精校^[2]。丛书编纂者一般而言都是学者,他们在出资刊刻丛书的同时还延聘权威专家校书,旨在追求精校。蒋凤藻编纂的《铁华馆丛书》就首先聘用大藏书家叶昌炽校书,卢文弨编纂的《抱经堂丛书》是自己编纂、自己出资刊刻、又自己校书等。清代著名学者黄丕烈、阮元、孙星衍等人自己编纂的丛书出资刊刻时,都延聘被称为“清代校勘第一人”的顾广圻校书。精校精刻,成为清代刻书界一种新追求、新风尚;连书商的小说、戏曲,也以精校精刻为标榜^[2]。

明清刻书数量,远远超过宋代。缪咏禾依据《中国古代善本书目》、《明代版刻综录》、《地方志综录》、小说戏曲书目等等资料,估计明朝刻书的总量为 35000 种左右之多。清朝的刻书总量迄今难以统计,仅仅将《清史稿·艺文志》的 9633 种、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 54880 种和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 10438 种三者相加(三者并无重复),总数为 74951 种,其中除小部分抄本与前代刻本外,绝大部分是清刻。与宋刻相比,明清两代刻本门类与品种更齐全,选题创新更多^[2]。这些刻本反映了当时刊刻状况,标志着明清时期出版业的发达程度,而发达的刻书业为保护和传承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近代出版业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一)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

明清时期,许多藏书家嗜书成癖、爱书如命,特别是对宋元善本推崇备至。而明代私刻技术很

高、刻本质量极好、贡献突出。明代大藏书家王世贞用一座庄园去换取宋代刻本《两汉书》；大藏书家徐火勃身患重病，竟用买药治病的钱买下一部元刻《丁鹤年诗》。可以想见，当得到一部宋元珍本善本书时，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保持其原貌。正因为如此，明代私人藏书家们将早已有之的影刻技术推向高潮，使影刻本成为一种重要的版本类型。影刻技术就是将薄纸覆于宋元版本书页之上，按其行款、字体、版式照样摹写，然后贴于版片上镌刻。有将宋元本拆散将书叶直接贴在版片上雕刻，为的是化一为千百，并保持宋元本原貌。

明代为配合士子阅读古文的需求，在出版印刷业兴起翻刻影刻宋本的风气。影宋覆宋之风由苏吴地区，很快波及全国。其源出于以苏州吴县为中心的一批私人藏书家，其中较著名的有正德年间陆元大复刻宋建康郡斋本《花间集》、《李太白集》等；嘉靖年间嘉趣堂复刻宋淳熙严州郡斋本《世说新语》和宋本《六臣注文选》；吴元恭太素馆仿刻宋本《尔雅经注》，被清代著名学者阮元誉为经注本之最善者；沈与文野竹斋翻刻《西京杂记》、《唐荆川集》等，以上刻书家均为吴县人^[3]。吴县还有黄鲁曾、黄贯曾、黄省曾兄弟三人，于嘉靖年间刻书很多。苏州的私家刻本还有郭云鹏济美堂的《柳宗元集》、徐时泰东雅堂的《韩昌黎集》、苏猷可通津草堂的《韩诗外传》和《论衡》等等^[3]。由于明清大藏书家注重善本和珍本，精校精刻书都可与宋本媲美。影宋覆宋影印本由于技术精湛，字体神韵都酷似原书，有的甚至达到乱真地步，所以后世书贾常常以明代嘉靖本冒充宋本，这固然是陋习，但这充分说明影印本是把一部部濒临亡佚的宋元善本化为千部百复本的最好方法。影印技术保护了古籍原貌，推动了学术发展，刻书家功绩可谓大矣^{[1]369}。

(二)活字和套印术改进，呈现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

1. 活字印刷技术的改进

宋元两代有泥活字和木活字，明代开始有金属活字。流传至今最早的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铜活字本，最有名的是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坚的兰雪堂和安国的桂坡馆。华氏以华燧会通馆时间最早，刻书最多。明弘治年间华燧就用铜活字印出《宋诸臣奏议》50册，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后又印行了《百川学海》等十多种卷帙浩繁大部头书籍，还印行《渭南文集》、《剑南诗稿》

等书。华坚兰雪堂曾印行《白氏文集》等。安国桂坡馆有“安百万”之称，印铜活字书可考者有10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唯一的最早用铜活字印刷的地方志；《常州府志》还记载他曾以铜活字印了《吴中水利通志》。安氏桂坡馆印行的书虽不如华氏多，但质量较华氏本高，这与其经济实力雄厚是分不开的^{[1]360-361}。

清代雍正年间用铜活字排印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书有10000卷之多，印本清晰美观，这是我国用活字排印字数最多的一部大型书^{[1]361}。此外，还有用锡、铅等金属材料做的活字进行印刷。清朝出现“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等活字印刷店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最大一次木活字印书活动。另外，泥活字上釉再烧，便可成为磁版印刷。

2. 套版印刷技术的改进

套印术到明代才得到广泛应用。我们今天常见的套印本，大部分是明代吴兴地区闵氏和凌氏刻本。闵、凌氏是吴兴望族，也是著名大藏书家和套印刻书世家。闵、凌氏两望族有刻书业绩可考的竟达数十位之多。两姓同邑，共操一业，世代相传，堪称中国套版印刷史上的“双璧”。闵氏的第一部套印书是明万历年（1616年）刻的《春秋左传》，朱墨两色本；第二年刻《孟子》苏老泉评本，已为三色本；到1620年印出了91卷、24册的《史记抄》这样的大部头印本。凌氏以凌濛初为典型代表，凌濛初是著名的戏曲小说家兼出版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及杂剧《虬髯客传》、《红拂记》、《琵琶记》等著作便是其编著。他刻印的书以戏曲、小说为多，且多套印并有插图，都是聘请名家绘刻的，字迹笔画工致，绘图人物神态秀逸。其传世品除上述戏曲外，还有《明珠记》和《南柯记》等。此外，凌濛初还有朱墨本《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三色本《古诗归》、《唐诗归》等量多质优的套印本^{[1]366}。

3. “恒版”和“拱花”印刷技术的发明

明清版画艺术在徽州、金陵、建安等地勃兴。版画附绘木刻插图，风格迥异，争奇斗艳，尤以徽州刻工技艺最为出色，当时涌现大批版画集。绘画、雕版和印刷技术融合，即形成彩色版画套印术（今称木版水印），使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到高峰。彩色版画套印继而发展为分色分版的套印法，称为“恒版”，“恒版”因其形似恒钉（五色小饼）得名。而“拱花”则是用凹凸两版嵌合，使得纸面拱起的

办法,富立体感,适用印鸟类羽毛和山水。“恒版”和“拱花”的印刷技术是明徽州刻书家胡正言的发明,闻名遐迩的《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是其代表作。“恒版”和“拱花”印刷技术使得雕版印刷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1]367-368}。

三、在编纂与出版文化成果方面发挥了文化传播的功效

(一)促进藏书家著书立说

明清时期对文化及图书出版事业非常重视,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由政府组织的编纂活动更频繁,其成果层出不穷,无论从哪方面都超出任何一个前代,尤以明代永乐年间编纂《永乐大典》及清代康、雍、乾三代编纂《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最为兴盛^{[1]327-336}。国家先后设立儒学,制定了八股取士制度,从而促使藏书出版事业兴盛。明代上上下下都以藏书为贵,刻书为荣,以示风雅。“朝贵达官,多有数万以上者”^{[1]319}。尤其在明代天启之后,出版业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

在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上,明代王世贞与清代朱彝尊的藏书事业都鼎盛一时,他们既是学界名流,又是藏书大家中的佼佼者。明代王世贞建有藏书楼三座,分别命名为“小酉馆”、“尔雅楼”和“九友斋”,仅“小酉馆”藏书楼中就藏精品书三万多卷,秘籍版本也达三千多卷,王世贞一生论著颇丰,在明代200多年中,其著作之富很少能有人与之相比;而清朝朱彝尊则建有著名的“曝书亭”,藏书达八万余卷,雄居清初江南藏书楼之首,其一生也是论著等身,主要有《经义考》三百卷等。两人都是中国藏书史上泰斗级的学者^[5]。

王世贞精史学,著《弇州史料》一百卷;又善戏曲,作有《鸣凤记》,他在文学上,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六人并称为“后七子”。李攀龙死后,王世贞成为文坛领袖,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世贞年轻时即嗜书,《明史》称他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藏书处有小酉馆、尔雅楼等多处,其所藏书有三万余卷,且多精本。“王长公小酉馆在弁州园凉风堂后,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尔雅楼度宋刻书,皆绝精,余每读《九友歌》辄泠然,作天际真人想。”^{[6]599}

朱彝尊编纂了卷帙浩大的专科版本目录学佳作——《经义考》《经义存亡考》,是由历代学者

诠释经书的著作,仿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体例编撰而成。该书资料网罗宏富,为两千年来说经之书的专科学目。《经》的编撰前后历时50余年,问世后得到极高评价。康熙赞曰:“朱彝尊此书甚好,留在南书房,可速刻完进呈。”^[5]又赐“研经博物”匾额,奖励朱氏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和成就。乾隆帝也曾题注:“自汉迄今,说经诸书存亡可考,文献足证;编辑之勤,考据之审,网罗之富,实有裨于经学。”^[5]清代毛奇龄学者称赞此部学术巨著:“非博极群籍,不能有此!”^[5]

(二)促进刊刻出版文化成果,成为中国手工印刷之集大成

明代官刻单位多,刻本数量大,涉及内容广,刻书质量相差悬殊。有“藩府本”(藩王刻本,属明代官刻本的上品)、“经厂本”(司礼监下设经厂的刻本,外形虽美,但内容不精)及“书帕本”(地方官互赠之本,等而下之),真正是私刻在刻书业技术最高、刻本质量也最好,贡献突出^{[1]345-348}。而清代的官刻“殿版”书(武英殿刻本)校勘极精,以康熙时期最盛,作为“康版”典范的《全唐诗》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佳作^{[1]354-355}。

我国古代藏书家一般均是出版家,藏书家热衷于藏书的翻刻,认为刊刻是藏书流布的最佳形式。如明代范钦、毛晋,清代鲍廷博、黄丕烈、纳兰性德乃至民国的刘承幹等,既是藏书巨擘,又是刻书大户,他们利用丰厚的藏书资源、富足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文化成果,对典籍的延续与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整个藏书体系中,私藏是官藏的重要补充,许多藏书家主动向社会提供自己的珍贵藏书作为刻印底本或校本。如杭州“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就曾向浙江书局提供过刻印底本和校本;《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皇帝颁命广泛采访官私藏书,其中许多民间藏书楼的书籍经过汇集进呈,才使得两部大书在此基础上得以编纂完成。如果没有各类藏书楼历年保存的大量书籍版本,要完成如此浩大文化工程是难以想象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有80%资料来自私家藏书,更由于藏书家进呈珍藏、精校蓝本,才使更多典藏得以流布和传播。

“江南书城”——“天一阁”不仅以藏书著称,在嘉靖、万历间刻书也不少。根据文献记载,天一阁所刊之书至少有以下诸种:《范钦奏议》四卷,嘉靖间(1522—1566)刊刻;《范氏奇书》二十一种,其目为《乾坤凿度》二卷附《周易乾坤凿度》二卷,《元

包经传》五卷,《元包数总义》二卷,《周易古占法》二卷,《周易略例》一卷,《周易举正》三卷,《京氏易传》三卷,《关氏易传》一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穆天子传》六卷,《孔子集语》二卷,《论语笔解》二卷,《郭氏翼庄》一卷,《广成子解》一卷,《三坟》一卷,《商子》五卷,《素履子》三卷,《竹书纪年》二卷,《潜虚》一卷,《潜虚发微论》一卷,《虎铃经》二十卷,嘉靖间(1522—1566)刊刻;《阮嗣宗集》二卷,晋阮籍撰,范钦、陈德明合刊,嘉靖间(1522—1566)刊刻;《天一阁帖》附三种,合十一种,万历间(1573—1620)刊刻;《海叟诗》三卷,明袁恺撰,万历间(1573—1620)刊刻;《三史统类臆断》一卷,明范大冲撰,万历间(1573—1620)刊刻;《司马温公稽古录》二十卷,宋司马光撰,万历间(1573—1620)刊刻;等等^{[6]587}。天一阁在当时文化界名声远扬,清代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7]而奠定“天下第一楼”崇高地位的是乾隆皇帝。乾隆38年,诏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藏书638种,朝野震动,乾隆大悦,赋诗曰“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并赐《古今图书集成》以示褒奖;还下谕昭示天下:“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8]

抄书与刻书,既是藏书家增益藏书的重要方式,又是藏书家传播文献的重要手段,使珍稀藏本广泛流布,增加珍本流传概率,对于文化成果的保存与流传极为有利。明代藏书家中有毛抄、文抄、沈抄、祁抄等珍贵抄本;而藏书家叶盛、沈与文、王延哲的刻书也很有名。大藏书家出版家毛晋一生刊刻书籍极多,对百家九流、唐宋别集、传记小说、道藏词曲等广加刊刻,数量多达200多种,毛晋家还影抄宋元珍本,抄录各种珍贵典籍,“毛抄”成为藏书家收集之珍物^[9]。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称毛晋“中年自群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说,靡不发雕,公诸海内,其有功于艺苑甚巨”^{[6]619}。“汲古阁”有楼房八间,上庑书版,楼下及厢廊为刻书工场,常年有工匠二十名左右为其刊版。四周有“绿君亭”、“二如亭”等,招延天下名士校书其中,人称“风流文雅,江都首推”^{[6]619}。毛晋之刻《十三经》、《十七史》,其精神可佩,自崇祯元年起至十三年庚辰止,每年刻一经,而《十三经》刻全。次年起刻《十七史》,唯中经忧患,崇祯十四、十五两年连年灾荒,经费无着,毛晋不得不卖田三百亩以继,而至十七年明清易代,

清兵南下,兵荒马乱,事业停顿,而一旦社会稍稍安定,即继续刻书,而《十七史》终成,前后共耗时多年,经费无数^{[6]621}。毛晋刻书十分注重质量,常选择家藏善本以作底本,并加鉴别。明清学者陈瑚言其刊书“子晋日坐阁下,手繙诸部,讎其讹谬”。钱谦益称:“毛晋故于经史全史,勘讎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缙帙”,“毛氏之书走天下”^{[6]621}。这足证毛氏刻书影响之巨。毛晋为了刻书用纸,专门派人从江西等地定制采购印书用纸,厚者称“毛边”纸、薄者称“毛太(泰)”纸之名,至今沿用,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绝少见的^{[6]622}。毛晋所刊书究竟有多少,很难说出一个精确的数字。毛晋传播文献,除大量择善本校勘刊印外,还首次创用了“影抄法”。据文献记载,毛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善本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槧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人称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使图章逼真,抄前先加腊。版心有“汲古阁”三字,栅栏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等字样,故影宋抄本以毛晋为最精^{[6]625}。

综上所述,明清是中国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的历史最为活跃、最具个性时期。

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藏书楼及其出版商蜂起中土,刻坊星罗棋布,刻书蔚然成风,刻书业在更大范围、以更为壮观的规模和更为激烈的竞争形式空前活跃地展开。概括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全国出现众多著名的出版中心和刻书业集散地。藏书楼刻书内容包罗万象,数量惊人,其刻书能力与刻书总量都大大超过前代之和。中国刻书业从两宋发展到明清时期,进入以民间刻书为主体的崭新阶段,于江南地区呈现出繁盛景象。其次,明清时期的藏书楼呈现出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精校精刻久负盛名,新出版技术不断被藏书家所发明,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并且活字印刷技术、套版及版画印刷技术都有长足进步,大力保护了古籍原貌,推动了学术发展,藏书楼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再次,明清藏书楼极其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与出版,可谓我国手工印刷业之集大成。此期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果,编辑出版业进入创作旺盛期,无不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准,对典籍

的保护、延续和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作用。中国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在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同时,为近代编辑出版业的发展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
[2]刘光裕.明清是中国古代出版的鼎盛时期[J].出版史料,2008,(9).
[3]肖东发.私家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九[J].编辑之友,1992,(3).

- [4]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58.
[5]刘芑.论学者型藏书家王世贞与朱彝尊[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8,(3).
[6]傅旋琮,等.中国藏书通史:下[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7]余秋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31.
[8][清]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七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9]牛红亮,等.略论明代的私家藏书[J].当代图书馆,2009,(3).

The Impacts of The Ancient Library on the Propagation of Modern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WEI Xiu-p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Library as site-specific collec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ancient heritage of the profou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promot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had played a positive impact. The Ancient Library and its inscribed publishing histo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the most active period and the most personalized period. This many well-known publishing center of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for the book industry carved, engraved book diverse content includes and prestigious, accurately examined and carved; Shadow lithography to make a photocopy of an important version of the type, and The Movable Type, The Taoban and The Printmaking Typography has considerable progress, diversified publishing technology presents the state of the modern publishing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technology;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mphasis on cultural achievements finishing collection, compilation and publishing,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come into the creation of strong, inscribed published a large amount of high quality cultural achievements, described as a master of handicraft printing, meanwhile it played an invaluable role on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books. Not only has the Chinese The Ancient Librar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modern publishing industry, but also become one of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publication.

Key words: The Ancient Library; modern editing and publishing; engraved book industry; publishing technology

[责任编辑:郑红翠]